

Collected Works of H.D. Fong

方显廷文集 5 上册



TIENTSIN CARPET INDUSTRY
RAYON AND COTTON WEAVING IN TIENTSIN
HOSTERY KNITTING IN TIENTSIN
R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GRAIN TRADE AND MILLING IN TIENTSIN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TIENTSIN
EXTENT AND REAC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TOWARD ECONOMIC CONTROL IN CHINA
ECONOMIC STATUS IN CHINA
CHINA'S FACTORY ACT AND
THE COTTON INDUSTRY
CHINA'S SILK REELING INDUSTRY
CO-OPERATIVE MARKETING OF
COTTON IN HOPEI PROVINCE
INDUSTRY ORGANIZATION IN CHINA
WAR-TIM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N THE LAND PROBLEMS OF CHINA
RUR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EKIANG
INDUSTRIAL CAPITAL IN CHINA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URAL INDUS-
TRY IN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FOR CHINA'S
SOUTHWEST
THE DESTINATION OF CHINA'S INDUSTRY
AND WAYS OF ITS REHABILITATION
TAIWAN'S INDUSTRIALIZ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CIES AND CONTROL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XPORTS
IN THE HOAPEI REGION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SMALL INDUSTRY IN SINGAPORE
WAR-TIM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1949-1953
WHAT SHOULD GO INTO
ABOU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方显廷文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主 编：厉以宁 熊性美

副主编：方惟琳

编 委：穆家修 常绍民 叶 坦 纪 辛
张世荣 方露茜 方菊龄 (Julie Thomas)
方 郁 魏 玥 关永强



方显廷

(1903—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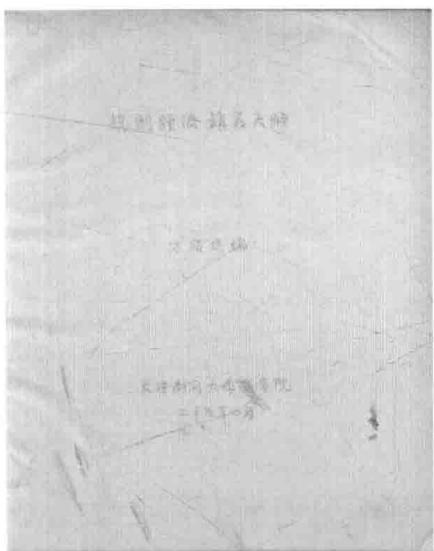


1941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任访问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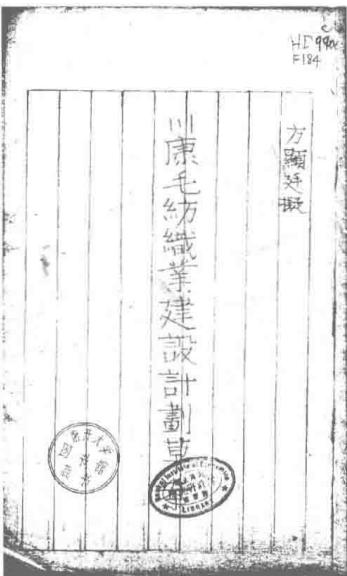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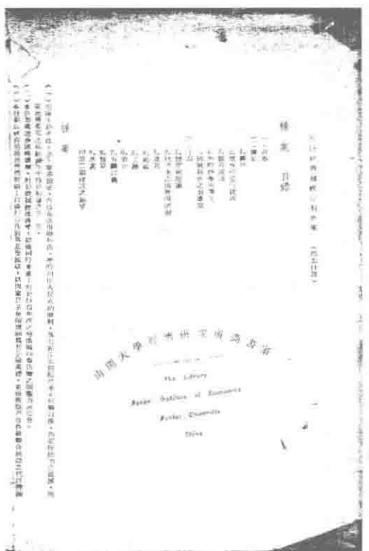


1940年在重庆南岸汪家花园何廉宅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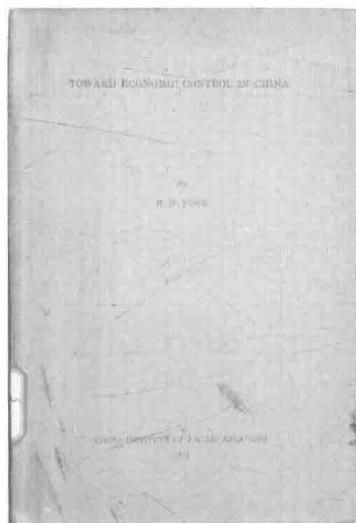
方夫人王静英(右1)、何夫人余舜芝(右3)、何廉(右5)、方显廷(左2)



本卷部分著述文章书影之一(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本卷部分著述文章书影之二(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中國之合作運動

(一) 引 言

「合作」二字，自廣漢言之為任何此社會活動之必要條件，惟言之無合作則人與社會無以形成。原始時代之人種穴居野處，日與風露水旱，惡食猛獸相奮鬥而卒獲勝利者，由於合作和敵合作之歷史實有大類之文明相終始。然依平等互助原則，謀其共同經濟利益之「合作運動」，則可謂之為十九世紀工業資本主義之副產物。英國與德意志為十九世紀工業發展之地，亦為世界二大合作派別之所發源。前者為消費合作社之發祥地，後者為生產合作社之起源所。一八四四年英國「羅達爾公司先導社」(The Equitable Pioneers of Rochdale)為消費合作社之先導，一八五二年德國之「雷費森」(Schulze-Delitzsch)及一八六四年之「雷費森」(Raiffeisen)鄉村信用合作社為生產合作社之先祖。工業資本主義遍及全球，其發達之結果，使上層階級民衆之富若日深。合

本卷部分著述文章书影之三(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民元史我國之經濟研究

方顯廷

中國經濟之癥結與統制

方顯廷

early increase of an unrestricted population. This appearance is always the result in new colonies, where the knowledge and industry of an old state operate on the freshly appropriated land of the new one.

pp. 65: Must it not then be acknowledged by an attentive examiner of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at in every age and in every state in which man has existed, or does now exist, that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s necessarily limited by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at population does invariably increase whe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increase, and that the expansive power of population is repressed, and the actual increase kept equal to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by misery and vice?

Chapter II
pp. 67-68: The great error under which Mr. Godwin labors throughout his whole work, is, the attributing almost all the woes and misery that are seen in civil

社會上的一般現象，到人口增加上去。他沒有看到，社會上的一般現象，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社會的政策所造成，並非單單是由於人口增加。他沒有看到，社會上的一般現象，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社會的政策所造成，並非單單是由於人口增加。

社會上的一般現象，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社會的政策所造成，並非單單是由於人口增加。他沒有看到，社會上的一般現象，是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社會的政策所造成，並非單單是由於人口增加。

合會有無潤化之趨勢，但以後的世界賴華各為底。大家既不能老死不相往來，則中國有利利用國際的聯繫。此即研究國際的著作各國力非常精進。中國文方面不應落後。作者盼望最近的將來在中國文字中能够找到一部關於國際場合會的偉大創作或者一部最有價值的譯譯本。

徐敦璽

關於銀價問題與中國文獻之介紹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金銀比價日形僵持，至一九三二年時，其比價雖仍繼續下降，但以金幣貿易之實情，與英美四國先後放棄金本位制，反呈上升之勢。中國為世界之主要用銀國家，在其後各國為商品之一，而惟在中國則為貨幣之本位。故銀價之漲落，非惟本動影響通貨，且對於全國之經濟組織，亦發生莫大之影響。銀價跌則國內貨幣入口而膨脹，貨幣貪圖而上漲，其結果，全國經濟日趨蕭條。銀價高則貨幣因海外流而縮減，物價因貨幣緊縮而下跌，其結果，全國經濟日趨衰弱。此理証之，年來擴內經濟發展之起伏與趨勢，為顧忌無庸多贅。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銀價之漲落，對於我國經濟組織之興衰，具有莫大之影響，故討論銀價問題者，自始頗不乏人。年來朝野上下，頗莫不以「銀價為中國」一問題為

中國經濟之本質——這篇將工商交通金融及財政各方面分析中國經濟之中古性質，半殖民地性質，中國經濟之整頓，現代化自由經濟之建設，經濟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建設，因之之分組，中國經濟之氣氛，（論水，光，火，煤，鐵，及基本問題）交通，農耕與編織，及貿易與軍事等之整頓）。

中國經濟，因時因地而異，中國之經濟與英國不同，即在同一國家，中古時代之經濟與近代之經濟亦復大相逕庭。茲請就中國古代經濟之本質加以分析，然後更进而研究因此種經濟發生之變動及其統制之方法。

三、中國經濟之氣氛：（論水，光，火，煤，鐵，及基本問題）

中國經濟之整頓，現代化自由經濟之建設，經濟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建設，因之之分組，中國經濟之氣氛，（論水，光，火，煤，鐵，及基本問題）交通，農耕與編織，及貿易與軍事等之整頓）。

中國經濟，因時因地而異，中國之經濟與英國不同，即在同一國家，中古時代之經濟與近代之經濟亦復大相逕庭。茲請就中國古代經濟之本質加以分析，然後更进而研究因此種經濟發生之變動及其統制之方法。

一、中國經濟之本質——中古性與半殖民地性

中國經濟之本質，言人人殊，集萬有奇載，詞而彼此不相容者，數年前李尚高、馬克斯、勞特對

整理地籍誌議

方輿

三、四、五

世評徐熙風有以俊之世也。藏其中間而以傲入之理恐爲史實名，如謂之記楚、負荆之名，乃「商賈」之形譯。曾侯乙宗巫廟曾侯自小宗之宦物中有名「秦商」，若謂爲秦國之工人。今「秦商」之名則爲秦國之工人。「匠官臣」以爲周「秦夫」，甚至蘇軾云：「未免串同之間，與諱意微有不同。」又左傳襄公四年「公問姬服」，謨書十四年。《見本草》二曰：「水本草也，其上亦赤色。」如謂此類顏色，作者隱然成真不長之說，要之無復大體之處也。猶崔延璽對答，在古文詩中一例，已知如許吉反古之七逆雖難，人言之，豈非可笑哉？

莫家明

中國合作文獻述評

我國之合作運動，雖非與農村運動一然其發展之迅速，並非其他俱區區運動所能比擬。其發展之迅速，尤以農民十七年江南、蘇南為甚。民國十七年以前，合作運動，以改善農民生活問題，及農業目標，惟推廣農業合作，而未有甚大發展。民國十七年以後，合作運動在農民黨及中央黨部各省當局倡之，則為七項農業運動之一，其推行區域，亦逐漸擴大，及全國由江浙而迄于水火保險，而收效之區域，而漸擴大，如華北、華東、陝甘青等區域。時至今日，全國之合作運動，已由十七年之七二二項，增至三十九年之九項。

治思想，於謂前作一叙論，然後集取申韓荀商之言，與墨翟
論作幾篇對比，則讀者不知莊子思想之圓滿者，未之有也。
荀子、莊子之勇為，又服誦舊之精義，故敢述其區區，聊寓有
道君子告焉。

戴家祥

中國土地問題文獻述評

上述兩面相土地分配及土地利用問題而因此兩面相土地之行政或土地法問題則亦包括在內。我國自長治十六年國府執政以來七地四廳——即直轄區上層分配問題——即受朝野上下之注意。至土地分配問題之中心，在土堆政策之確立。孫總理之民生主義，既以平均地權為農民財資為中心主張，則土地分配問題之空同農民之注目，及南京政府之青壯、忠誠、愚忠、勤奮、增加之年青共耕者，亦以土地問題為得召民衆之利器。而國府爲尊崇農業之政策，亦首先發在江浙蘇鄂等桂籍諸省，滿清二五級租稅令。十九年立法院復根據孫總理之平均地權方案，通過七地四廳。該法雖至今未達確實施行，然其包括範圍之廣，而農夫制實含蓄之情形，固惟全世界第一。此外，各省名政，如田賦制、公有收入之獎勵政策、土地耕作等等，又以爲整理田賦之基本辦法。

據先進經驗內而謂之。右有熟曉一詞以合作較為大聯合運動與
互通貨物交易。以有甚麼。只說萬中城市交易。程啟高便道。

卷之三

寧屬之資源及其發展途径

心曉齋詩稿卷之三

九

馬沙爾經濟學概念之研究

(甲) 經濟學之定義

所謂的「中間關係」是不一樣的。在社會學家有一派認為有「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若者認為研究方法不同，所創建的範疇不一樣，所以不能統一。我們可以說出四種社會學的問題：第一是以社會組織為研究的中心的學術，第二是以社會制度為研究的中心的學術，第三是以社會文化為研究的中心的學術，第四以全體組織為研究的中心的學術。

所探討的中心並不一樣。在於各項都有各項的定義，而至各項有各自不同的定義。

在這些枝的定義裏，我可舉出四項重要的類型來分別。第一是以全體社會為研究中心的定義，第二是以批判研究為研究中心的定義，第三是以批判為研究中心的定義，第四是以全體社會為研究中心的定義。

究研之念概學濟經兩步

經濟文選

中國之國民所得

方順廷

中華民族滿意的，當然是他的勢力範圍。他說：「我對中國人沒有半點興趣，中國人對我沒有半點興趣。」這就是他對中國人所抱的態度，是極端的一種。他完全支配的價值觀念，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

本卷部分著

THE JOURNAL OF CLIMATE

10

本卷部分著述文章书影之六(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总序

厉以宁

我是 1951 年 9 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 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 1951 年我进入北大到 2008 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 58 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 2006 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 6 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 年他 94 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2006 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 年他 3 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1910 年他 7 岁时，父亲病故，

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 岁那年(1917 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 年,方显廷先生 18 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 25 岁。第二年(1929 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 1931 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 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

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①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

^① 参看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135页。

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①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②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

①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71页。

② 同上。

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①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②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六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③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于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① 参看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第138—13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① 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② 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

^① 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

^②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1页。

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里,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之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导”。^①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

^① 方显廷著,方露茜译:《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5页。